



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兼论路遥的文学观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思潮

杨 辉

内容提要 《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并非关于《平凡的世界》创作情况的简单“回顾”，而是从其“源起”阶段，即包含着内在的论辩性质。既回应李继凯《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一文针对其创作的若干批评意见，也一次性地回应自《人生》以来评论界关于其创作的重要批评观点，进而系统阐发其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反潮流”意义的思想和美学观念。该作涉及“总体性”视域、现实主义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意义和可能，以及文学与时代、土地和人民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性地观照其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复杂蕴涵，不仅可以敞开重新理解路遥现实主义文学观及其意义的新的可能性，亦是重申作为本体和方法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美学文本；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学

—

1991 年初冬，尚未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所致的巨大生命损耗中休整过来的路遥结束“调整期”，并放弃率团出国访问的机会，开始全力以赴写作《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以每日千字的速度，至次年初春全部完成。这一部被命名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长达 6 万余字的创作随笔先连续刊发于《铜川矿工报》副刊，继而在《女友》杂志上连载，嗣后接连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两种单行本行世。将《早晨从中午开始》“一稿多投”并同期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五卷本《路遥文集》，乃是较大的经济和生活困难使然^[1]。上述两种作品（集）完成之后不足一年，路遥即与世长辞。就创作整体论，《路遥文集》和《早晨从中午开始》似有自我“总结”和“诗的遗嘱”的意味。“他不只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还要完成像《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样的创作谈。”如此，“路遥才算真正完成自己英

雄而悲壮的人生史诗般的总结”^[2]。由《优胜红旗》《代理队长》《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作品，到《平凡的世界》、再到《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个前后有序、稳定且闭合的阐释系统就此确立。英年早逝的路遥终止于 42 岁的写作，似乎因此有了内在的“完成”性。但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路遥虽自知患病已久，却并未对生命的“大限”有明确认识，故而“绝笔”甚或“自我总结”之说未必妥当^[3]。尤须注意的是，《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写作尚有一重要的现实触发点——文艺理论家畅广元 20 世纪 90 年代末动念编撰一册陕西作家心理研究论集，路遥属其中重要研究对象。或因畅广元所设定的“三极对话”契合路遥彼时的心境，路遥郑重表示：“畅老师，你主编这部书，我鼎力支持。这次我下决心回答评论界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4]而作为“三极对话”之一，时为青年学者的李继凯的《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一文提出的若干批评意见，则直接影响到《早晨从中午开始》所涉的问题论域。较为复杂的“缘起”，使得《早晨从中午开始》一开始便有



着远较《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的自我总结更为丰富、复杂的蕴涵。为总体性地回应关于其创作的若干重要批评意见,《早晨从中午开始》既有对80年代文学观念及其局限的反思,亦有对其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视域、资源和表现手法的自我说明。如是种种,涉及文学与时代、意识形态和现实等重大理论问题。在更为宏阔的视域中回应上述问题,申明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时代意义和复杂内涵,为《早晨从中午开始》作为“批评”和“美学”文本的要义所在。

重返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学现场,触发路遥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直接原因即不难明了。其时,曾有力地推动新时期陕西文学蓬勃发展的“笔耕文学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畅广元动念编撰《神秘黑箱的窥视》一书,以深入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为避免单一研究视域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该书设想出作家、评论家、青年学者“三极对话”的方式。具体展开路径如下:“年轻的学者首先写出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论文,作家在看过论文后,既可以对其作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评论,也可以按自己的思路,随心所欲地讲述自身的创作经验与体悟”。有此两者可能的“交锋”之后,年长的评论家则进一步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5]。如此,“三极对话”方始完成。时隔多年之后,李继凯回忆“三极对话”的完成路径,对其“论辩”特征有更为确切的说明:“年轻学者率先‘发难’,主要针对作家创作心理特别是创作心理障碍等进行剖析(他认为陕西几位实力作家有水平却仍需要新的突破);接着,作家在看过年轻学者论文后,自由自主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悟,有表白,更希望有辩驳”,最后再由知名评论家在阅读前两者文章之后,“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颇有‘摆平’或‘升华’的意味”^[6]。如是“三极对话”的方式,意在营构多元共在的思想场域,“让读者透过对话,感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呈现’,从而有利于从不同的方面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7]。

“三极对话”的目的,并非是对作家作品展开简单的综合研究,而是奠基于畅广元以及“笔耕文学研究小组”其他重要成员对其时陕西中青年作家

成就的充分理解和“局限”的明确认识。论集选定的研究对象仅有五位,依次为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似皆可谓一时之选。路遥其时已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数月之后即获茅盾文学奖。贾平凹也已完成了其兼具“寻根”与“改革”双重面向的重要作品《浮躁》且屡获大奖。而作为其“中年变法”标志的长篇小说《废都》已在酝酿之中,并最终完成于《神秘黑箱的窥视》出版之前。斩获国内多种重要奖项的陈忠实此时已完成《白鹿原》初稿,正在进行初步的修改工作。邹志安、李天芳亦属彼时陕西中青年作家之翘楚,创作成绩在同辈作家中较为突出。其时,上述五位作家均已人到中年,虽成就较高,但仍然存在着有待突破的个人“局限”——贾平凹、陈忠实其时正在独立展开的“中年变法”,即充分说明畅广元和彼时陕西作协领导胡采、李若冰的远见。但“三极对话”的设想虽好,具体实施起来却可能面临重重困难。为统一认识,最大限度地完成预定目标,畅广元特意召集参与对话的作家和评论家召开编前座谈会,一致确定此次对话的宗旨为:“无论如何要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作品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千万不要随波逐流,一味给作家抬轿子。”^[8]

亲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至20世纪90年代末评论界的诸种不同“反应”(评价路径的“分歧”)的路遥,却对“三极对话”能在何种意义上达成心怀忧虑:“讲实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有了影响的作家。我担心这次搞三极对话,弄不好会成为相互唱和,结果反倒是好话连篇。希望这次能说到做到,面对作品,不讲情面,讲点实在的东西。”^[9]从成书后的情况看,路遥的忧虑不无道理,关于贾平凹和陈忠实的论文即较少“锋芒”。贾、陈二位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如编撰者所期望的那样,系统“回应”青年学者的观点。而作为三极对话的重要一极的评论家的文章,亦未能尽数起到与青年学者和作家“对话”的功能。就此而言,路遥对“三极对话”的认真回应使得该书即便未能全数完成原初设想,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回应批评意见的同时,路遥对自身文学和世界观念的系统阐述,留下了关于其美学观念的重要文本。在读完李继凯文章之后,路



遥表示：“文章写得很认真，有不少话说到点子上了。当然，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一定要认真写一篇文章作答。”^[10]正因“三极对话”的构想和李继凯文章的触发，路遥下决心总体回应批评界关于其作品的批评意见。路遥对李继凯及其他评论家观点的总体回应，类同于60年代初柳青以《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系统回应严家炎关于《创业史》的批评意见。因为后者的观点，涉及若干需要深入辨析的重要问题^[11]。《早晨从中午开始》因此虽围绕《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和相关批评展开，但理论视域和问题意识，却远未局限于此。

二

“三极对话”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后，李继凯于次年4月即完成一篇4万余字的长文，名为《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为撰写此文，李继凯“阅读了能够找到的路遥的全部作品”，还专门到作协就若干重要问题请教过路遥，甚至“在餐桌上都愿意坐在路遥身边，询问他吃酒席和当年饥饿至极的不同感受”^[12]——此问题无疑涉及路遥创作心理的重要维度。历经数月，文章写作完成。该文视域宏阔、结构谨严、论证扎实，涉及到路遥创作的多个核心问题，自然多所肯定，但亦不乏“锐见”。其对路遥创作“局限”的认识，以“道德化”及其问题性最为突出。在李继凯看来，“路遥在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时，总是时刻没有忘记道德伦理的人生准则”^[13]。而正因“心中有这种‘道德自律’的准绳”，路遥在面临“复杂型的人物时，尽管有种种犹豫，但最终往往还是要勉力给出明晰的道德判断”。此种“道德”，也带有“‘固有’或‘传统’的性质”^[14]。如是对人物的道德判断，以《人生》中对高加林命运的处理最为典型。若照一般性的方式处理，则高加林“‘于连式’的个人奋斗”，或有“追求自我实现和反拨不平压迫的积极意义”，何况其奋斗已为或将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受制于“对道德至上的伦理型文化的皈依”，路遥“绝不会给加林安排一个顺利发展、飞黄腾达的人生结局”，因为依路遥之见，“高加林实在未曾通过‘德顺爷爷’所象征

的那道‘道德关卡’”^[15]。《人生》以高加林重返乡里并扑倒在德顺爷脚下痛苦地喊叫一声“我的亲人哪……”作结，近乎《平凡的世界》中王满银“浪子回头”的模式，即无论其在外如何“折腾”，最终均会“重新皈依”高家村“公认的那种完善的道德准则”^[16]。李继凯所论，涉及彼此深度关联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为《人生》对高加林命运的处理的“合理性”；其二为以“道德化倾向”（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作为作品的终极视域的“适切性”。前者关涉到如何总体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涉及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视域的内在价值分野。

以高加林命运处理的客观原因为切入点，路遥依次论及个人与时代、文学和现实、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下意义等重要问题。他并不认同评论界（不局限于李继凯的批评）对其“回归土地”的倾向的批评意见，以为高加林最终的“回归”，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据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回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结”，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脐带，等等。

首先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17]

路遥的辩驳无疑涉及观念的“新”“旧”之争、“城”“乡”之辩以及如何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求“新”与“变”乃时代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倾向。一旦被认为尚在陈旧的观念模式之中写作，作品必然有被归入



另册之虞^[18]。对此种评价，路遥显然不能赞同。更何况促使高加林经历内外煎熬之后重返生活“起点”的并非路遥个人，而是“生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路遥也无意于强行“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他以为这样的问题，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19]。路遥如是回应这一问题的潜台词显然相通于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不能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的现实，则任何关于世界的可能的阐释不过空言而已。如果稍稍放宽视界，以《人生》写作完成前一年（1980）国内影响极大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潘晓讨论”）为参照，可知路遥如是是为《人生》结尾“辩护”的历史合理性。“潘晓讨论”起始于1980年5月，其极为深刻地关涉到“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潘晓”接受“思想”的基础教育阶段，个人的人生意义因与“集体意义、大历史意义联结”而有着较为稳固的表达，“能和集体意义、大历史意义正相关联的人生意义才是正当的，真正的意义”^[20]。

作为高加林的“前辈”，50年代的时代新人梁生宝的人生选择正因与宏大历史核心主题密切相关而有着超稳定的意义。以梁生宝为镜像，徐改霞“进城”的可能性显然并不属于时代选择的主潮。其“进城难题”在50年代也并不难有合乎时代情理的结论。但时隔30余年后，高加林却已无可能认同留在农村的选择。在其身处的80年代，“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和精神优势已经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历史”，“整体中的个人和个人意义上的整体”已然“解体”，“小二黑一旦变成了高加林就再也无法回到他以前的背景中去”。文学也因此只能从“社会中退步出来，成为个人讲述故事的方式”^[21]。但崛起的“个人”仍无从超克外部世界的种种规约而自由伸张其欲望。高加林命运的起伏、成败均是高度历史性的。极具症候意味的是，高明楼和梁生宝差不多属同一代人，也可能分享过50年代的时代的时代的精神成果，但与梁生宝心系“集体”而罔顾“个人”利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明楼已无梁生宝时代基层干部公而忘私的优良品质。而“正是利益诉求的高度个人化集中才会导致社会冲

突爆发，进而触发公领域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人生》中所呈现的“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变异，利益重组所带来的内部分化，劳动意识形态的崩溃”，等等^[22]。置身“公”“私”颠倒、“个人”与“集体”脱节的时代，身处底层的高加林几乎无法在乡村获得其所希望的成功。不仅如此，“到城里去”虽为足以让高加林宏图大展的重要路径，却并不自然敞开。问题的核心因此在于，唯有重申“关注社会最低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并切实解决阶层固化等社会现实问题，高加林们的人生问题方能得到更具历史意义的解决^[23]。他们迫切需要的并非是关于其命运的基于浪漫情怀的虚幻处理，而是如何在社会实践意义上改变其境况产生的根源^[24]。

关于《人生》结尾评价分歧的背后，乃是“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之间的价值分野。路遥的文学观念，奠基于《讲话》以降的“人民文艺”的思想和审美传统^[25]，与20世纪80年代宗法五四启蒙意义上的“人的文学”的基本传统并不相同。而后者因“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广泛流播几成其时文学观念和批评的“成规”。“用80年代建构起来的‘艺术’、‘诗意’和‘美’的标准来重新评价‘人民文艺’，认为高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损坏了其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这一潮流背后蕴含着的则是‘现代化叙事’对文学史图景的重构，以及这种重构中必然包含的对‘前现代的’、‘乡村的’和‘非审美’的‘人民文艺’的贬斥。”^[26]在“现代化的文学叙事”所敞开的朝向未来的世界构想中，“土地”“农村”属“陈旧”与“落后”的象征，是正在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所应克服的“问题”——“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27]。姑且不论“回归土地”并非表明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只能终结于农村，仅就“农村问题”作为80年代具体的历史的问题而言，即可知并不能简单地以“进步”抑或“落后”判定“进城”与“返乡”两种人生道路的差别。更具历史症候意味的是，自1942年《讲话》以降，重新书写“农村”渐成潮流，赵树理、丁玲，包括柳青在1942—1949年间多部作品所敞开的农村，一改现代作家笔下作为旧中国的象征的农



村浓重的颓败之势，而成为新的世界渐次展开的欣欣向荣之境。其间质性的变化无疑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诉求，此后“十七年”文学之乡村叙述大致沿着这一路线持续展开。农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包含着积极、复杂的历史能量。80年代以降对“农村”的新的想象再度回归20世纪初农村书写的主潮之中，其间历史的反复及其意义，恰属路遥重评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其症候集中体现于论者的如下质疑之中，“为什么努力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解放区一十七年文学，算不上‘人的文学’？而只有那些把劳动人民写得非常愚昧落后、缺乏人性自觉的文学”，“才是凸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美学趣味”^[28]。“精英”观念与“大众”视域的分野^[29]，乃是评判《人生》中高加林的“结局”无法绕开的重要问题。延续“人民文艺”的基本理路的路遥的写作，也自然与接续启蒙传统的“人的文学”的世界想象之间存在“矛盾”，是为“城”“乡”之辩的症结所在。

高加林开放式的人生“结局”及其所敞开的现实难题同时涉及文学与文化观念的“古”“今”之争——即如何看待德顺爷对高加林的选择所作的若干“道德训诫”的意义。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五四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所形塑的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文化无意识再度成为时代的潮流。作为《人生》中“点题”的重要人物，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德顺爷所依凭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似乎略有“不合时宜”之嫌。当此之际，以个人奋斗为基本方式的人生愿景依托宏大的现代化想象一路高歌猛进。其流风所及，“人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定：即使是加林式的个人主义”，也远胜其父辈所持有的“封建的奴化主义”^[30]。以“封建”和具有启蒙意义的世界想象对举来表明此种观念中所蕴含的“新”“旧”之争，为五四以降处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关系的惯常模式。“新”被视为“‘善’的象征”，与作为“万恶之源”的“旧”判然有别。“新”与“旧”的对立，“不完全是时序先后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善恶之别，是非之别，与高下之别”^[31]。在此一思想范式中，德顺爷所依凭的价值观念自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先进性，其适用性似乎也大可怀

疑。也因此，“人们在读《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结尾部分时，多有一种不满足或怀疑的感觉，因为加林与少平的道德化的‘回归’，似乎并未将人们引到一片新道德的天地之中去”^[32]。

对上述问题更具历史感的解释，仍需回归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和思想现场。自历史的整体状况看，80年代的思想格局并不单一。“文化热”所开显之三种思想路径及方法也表明重述古今中西关系的多种可能。几乎在李继凯写作此文的同时，陈忠实完成了其重要作品《白鹿原》初稿的写作。不同于此前以《蓝袍先生》等为代表的关于“封建伦理道德”“落后”与“陈旧”（甚或“吃人”）的惯常叙述，《白鹿原》在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寄予了对儒家伦理之经世功能及其衰微的哀婉与叹惜。依此逻辑展开的文学世界，儒家伦理道德在观念的易代之际虽面临多重挑战，但作为其在实践层面的代表人物，白嘉轩傲然立于白鹿原之上，一任外部世界风云舒卷、王旗变幻，坚信白鹿原子弟无论如何叛逆如何意图逃离，最终仍需跪倒在具有复杂文化象征的祠堂之中。“白鹿原”作为重要意象因之并非单纯的地域的指称，而是有着文化、族群、民族精神象征的多重意义——或也表征着古典传统之精义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复兴复壮的可能。并非偶然，虽未如白嘉轩一般有精神世界更为复杂的展开，构成德顺爷精神基础的，同样是儒家思想及其在现实化过程中所形成之伦理道德规范^[33]。此种规范及其在传统社会所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确与启蒙思想所持守之个人信念存在差别。但在80年代初具体的历史氛围之中，如高加林般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追求、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所身处的自我和社会矛盾，均无法“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34]。以是否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做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作为文学价值有无之标准的路遥，并不赞同无视自然的自然规律，仅从“概念”和“理论”出发的写作路向，以为据此写作，属胶柱鼓瑟，不过塑造出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画不好圆圈的‘高大全’”^[35]。而在历史的具体氛围中



理解人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方式，则德顺爷所持有的“道德判断”，无疑属在人生观念转型之际高加林所能依凭之重要思想资源。这便可以理解何以德顺爷形象的出现让几乎陷入写作的“绝境”的路遥“绝处逢生”——他不知应该如何安排高加林的结局：“与高加林一样，路遥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不知该何去何从。他说他在自己的生活积累之中苦苦地搜寻着，追索着，直到德顺爷的形象瞬息间在他的头脑中浮现出来。”^[36]——被迫返乡的高加林也因此有了精神可能的依托。这依托既寄托着路遥深厚的“作家的感情”^[37]，也表明即便在唯新是举、不遑他顾的80年代，古典思想及其所形塑之人格，仍有未可简单估量的重要价值。高加林返归乡里从乡村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中获致精神依托的处理，便不能简单地被视为“陈旧”的观念而作“褊狭”的阐释。而由“当代中国”到“历史中国”的书写，属路遥彼时正在酝酿的“中年变法”的重要路径。在柳青的启发之下，路遥开始将写作重心从“当代纪事”转向对民族历史命运的关切^[38]。这种努力，与陈忠实、贾平凹同期展开的“中年变法”大致相通。而接续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以开出当代写作的新面向，如今也已成为文学观念转换路径之一种。这充分说明路遥文学观念的前瞻性和包容度，及其虽扎根80年代的社会现实，却涵容历史并指向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

通过回应自《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批评界对其作品涉及重要问题的若干批评意见，从而系统阐述其不同时流（即其所谓的“反潮流”）的思想和美学观念，为路遥写作《早晨从中午开始》更为阔大的用心。照路遥最初的构想，该作将涉及以下四个论题：“一、关于创作中作家的感情；二、作家的态度与人物的性格；三、评论家的视野与作家的艺术感受；四、关于黄土地。”^[39]从对20世纪80年代以降种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整体反思到个人写作之追求——包括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的自我说明，再到对作家与土地、文学与时

代关系等问题的思考，路遥力图深入地阐述其思想和文学观念。

以阐发现实主义及其所依托之思想和审美传统的意义为中心，路遥此举无疑有着极为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具体原因有二：一为1986年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被《当代》杂志退稿；一为1986年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讨会上所遭遇的批评意见。对于前者之深层原因，《当代》编辑周昌义后来有较为详尽的说明，其对彼时阅读感受的回顾，亦具有80年代中期文学观念（潮流）的症候意义：

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40]

时隔多年之后，已有更为宽广的文学视域（与1986年一般，其文学观念仍然是高度历史性的，属时代“潮流”之自然反映）的周昌义意识到其彼时有此阅读感受的原因，在于无意识地被80年代中期潮流化的文学观念挟裹而去。“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读小说——

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41]

从周昌义回忆的要点看，他当年退稿《平凡的世界》，皆因该作“过时的”现实主义手法：“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42]自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始，路遥的写作便与向以现实主义文学重镇著称的《当代》渊源颇深。正因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主编秦兆阳的欣赏，使得屡遭退稿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得以刊发并获首届全国优



秀中篇小说奖，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改变了路遥的命运。曾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名世的秦兆阳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意义的独特理解，无疑也给尚在写作探索期的路遥以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路遥接续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决心。因是之故，此番《当代》退稿，对路遥的打击必然远较一部作品的退稿更甚。所幸有《花城》杂志谢望新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李金玉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肯定，路遥虽略感沮丧，似乎也不必在退稿一事上心存压力，集中精力完成作品后两部即可。

但对数年潜心为《平凡的世界》做写作的准备，无暇顾及文坛风潮的路遥而言，文学潮流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此时不过初现端倪。在是年冬《花城》与《小说评论》杂志联合召开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讨会上，路遥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精神压力。此次会议集中了当时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如朱寨、何西来、何镇邦、雷达、蔡葵、曾镇南、李炳银、王富仁等，阵容可谓强大。研讨会纪要以《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为题刊发于《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该纪要以如下段落总括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观点：

评论家们给予小说以这样的总体评价，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43]

如今看来，上述具有总括意义的整体评价不可谓不准确，但在1986年末以“现实主义”“肯定”一部新作，却包含着耐人深思的复杂意味。需要注意的是，该文在以绝大多数观点肯定该作多方面的价值之后，亦述及其不足：“有的同志指出，作品开头有些徐缓，其中有些章节读来有些沉闷、板滞。”^[44]是说无疑类同于周昌义的阅读感受，足见二者分享的乃是同一种文学观念。虽无资料表明此说出自何人之口，但从会议的部分参与者及相关

人员事后的“补叙”看，此次会议应当有远较纪要丰富复杂的内容。如与路遥交往甚厚的白描的回忆，展现的即是此次会议的另一种面向。

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45]

“绝大多数”“失望”“失败”这样的表述与会议纪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据周昌义回忆，那一次研讨会自己虽无缘参加，但从参与会议的编辑部同仁反馈的信息看，至少“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46]。或因这样的原因，《花城》刊出该作第一部之后再无后续。第二部并未在文学期刊发表，第三部则在较之《花城》更为“偏远”的《黄河》刊出。由此可见此次会议之于《平凡的世界》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应，对该作期望甚高且尚未完成后两部的路遥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最后“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47]。

彼时路遥复杂的心理状况如今已难以尽知，但不难想见，此后虽有蔡葵、曾镇南等评论家对《平凡的世界》和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不同程度的肯定，却仍不能消弭其时总体的文学形势之于路遥的“压力”。“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兴起及其对柳青文学遗产的“重评”，也表明文学史观念范式的转换及其确立的新格局并不利于《平凡的世界》意义的敞开^[48]。路遥需要以强大的力量申明其价值坚守的重要意义。《早晨从中午开始》论及文学形势和他对现实主义传统赓续的原因计有两次。第一次可谓“总论”，集中在第6—9节。第二次恰在第一部完成之后（即北京研讨会后），属进一步的详细申论，在31至33节。两处所论之侧重虽略有不同，但均在回应关于该作写作手法的批评意见，关涉到其时的文学形势和文学评价的“成规”。“按当时的文学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49]。如果说



在为《平凡的世界》做写作的准备期，路遥无暇顾及文坛新潮，周昌义的退稿和北京研讨会上的批评声音，无疑迫使其对此一问题做充分、深入的思考。在突击阅读^[50]其时流行的新潮作品之后，路遥以为，此类作品大多尚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并不成熟，虽不乏文学形式变革的意义，但显然被文艺理论界“过分夸大”。现代派在其时具有排他性的巨大影响，暴露出的恰是批评界文学观念的褊狭。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样式……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高深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51]

路遥对现实主义以及现代派的理解，显然并不局限于写作手法，而是充分考虑到其所关涉的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现实等等更为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根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52]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背景中思考题材的意义，乃是路遥写作的重要特征^[53]。他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透彻理解，近乎詹姆逊将政治作为文学评价的基本视域的观念。扎根于个人生命实感经验的价值关切，也自然与对“下层阶级”作为“‘人’的生存的深切关注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的叙事努力”^[54]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密切相关。以柳青传统为中介，在社会现实的宏阔视域中思考文学手法及其意义，也是路遥文学观的基本特征。“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55]此种“精神”也并非单纯的主体的价值和审美偏好所能简单概括，而是统合了作家关于传统、时代和现实诸种复杂因素的深刻洞见。形式亦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脱离特定的社会思想视域架空理解。“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56]毋须指明路遥文学观念中更为宏阔的思想考量的意识形态意味^[57]，仅就对现实主义与“历史范畴”连续性的关系的看重而言，便可知他对文学手法背后所关涉

的复杂的思想问题所知甚深。如论者所言，“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是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58]。因为现实主义作家给艺术提出的任务，“是在现实本身中，在各种现实力量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倾向的斗争和冲突中给进步的理想找到依托”^[59]。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学说的”性质，“决定了现实主义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60]。具体表现为强调文学作为社会实践之重要一种的经世功能和实践意义，其背后有更为宏阔的思想考量和复杂的世界关切。以此观念为基础的写作，一开始即与以单纯的自我情感表达为目的的写作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此种分歧，与60年代中期苏契科夫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文学观念上的分野的辨析颇多相似。“围绕现实主义而进行的争论极其鲜明地揭示出争论双方立场和审美观的分歧，揭示出在理解艺术的社会使命以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系方面的差异。”^[61]“现代资产阶级美学、资产阶级艺术的特点在于装模作样地强调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对充满剧烈冲突和矛盾的社会生活的虚假的独立性。使艺术脱离时代的极端重要问题，这一意向也贯穿在资产阶级作家的美学纲领和创作实践之中。”^[62]文学叙事，则以其对已然和应然事物总体处理的优势，而有与宏大的社会构想内里相通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进步的真正涵义在于人制订出关于宇宙、社会和自身的符合真理的观念，在于人的理智创造出无论就整体和局部而言都是真正现实界的真实图景。这种深入理解现实界的客观内容的运动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一切形式——研究自然现象各种规律的自然科学，依靠科学共产主义武装了人类的社会思想，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以及在同等程度上的艺术——所特有的。^[63]

此亦为卢卡契强调总体性与现实主义关系的要义所在，亦是作为社会实践之一种的文学的根本体现。置身20世纪90年代初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路遥虽已难于使用与苏契科夫相同的话语表达其对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分歧的看法，但他们显然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逻辑。现实主义与“读者大众”，现代派与“少数人”^[64]的对举大致可与“底



层”（大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对照理解，其背后关联的乃是“人民文艺”和“人的文学”之间的分歧，其要点“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将原本不在视野中的‘绝大多数民众’纳入相应的‘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之中^[65]。“人民文艺”的兴起及其意义，莫基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发的文学观念。其意义并非仅局限于文艺问题，而是与更为宏阔的世界构想密切相关。对此问题深入、透彻的理解，构成了路遥文学观念的核心。“我们必须遵照《讲话》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永远和人民群众的心一起搏动，永远做普通劳动者中间的一员，书写他们可歌可泣可敬的历史——这是我们艺术生命的根。”^[66]路遥对现实主义传统及其所依托的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坚守，也需要在同样的意义上得到理解。

意图在总体性意义上书写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必然与现实主义精神及其所依托的思想和审美传统密不可分。如卢卡契所论，不同于现代派文学对个人性的、碎片化甚或私密生活的书写兴趣，“每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实践，都表明了客观的社会总联系的重要性和为掌握这种联系所必须的‘全面性要求’”^[67]。出于深刻反映客观现实，进而“使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朝着进步方向继续发展”^[68]的目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笔下所敞开的文学世界必然深度关联着根源于总体性思想的现实关怀。如柳青“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的了解”，而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69]，《平凡的世界》宏阔视域的构想无疑是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地方与全局、个人与世界的多元融通，且可表征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总体面貌的完整图景。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路遥力图以“某种程度上的编年史的方式”结构《平凡的世界》。以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超长篇幅，“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70]。他不仅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且不回避对生活作出“哲

学判断”^[71]。也因此，《平凡的世界》成为20世纪80年代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复杂面貌整体呈现的典范之作，包含着其时总体性视域世界构想的重要可能。其对80年代的时代“新人”的历史性描绘，上承《创业史》所开启的思想和审美传统，下开90年代后当代文学“新人”书写的基本面向。如是种种，决定了《平凡的世界》所属之思想和审美谱系的现实主义特征。

就历史的整体状况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能依托之“传统”，维度可谓多端。既可上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亦可赓续中国古典文脉，甚至师法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亦属路径之一。然而不容回避的问题仍然是，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文学仍在继续，而如何看待1942—1976年间以《讲话》“为依据的主流文学”，成为考校80年代文学观念视域的重要维度，至今尚未有更为妥帖的解决方案。当代文学史写作之所以难有大的突破，此为症结之一^[72]。路遥在此语境中对社会主义文学若干重要原则的坚守也因此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经由对个人生命实感经验与时代潮流的“常”与“变”的深切反思，路遥并不赞同随波逐流的文学观念，而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世界观察，始终扎根于《讲话》以降的思想传统之中。因此，秦兆阳认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很独特”，彼时文坛尚未有任何一篇作品像这样去反映这一段生活，其中对斗争的描写虽稍显“残酷”，但“基调给人的感觉还是高昂的”^[73]。尤需注意的是，在此后为该作所写的评论文章中，秦兆阳充分肯定路遥基于历史连续性的世界观察。秦兆阳的肯定无疑强化了路遥对其所持有的“深沉的历史观”^[74]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信。如其所论，“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75]，而从长远的历史视域看去，则在“赶形势，赶时髦”的意义上写作的作品，难脱短时期观念的局限。“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这种文学历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带有摸索前行的性质。”^[76]《惊心动魄的一幕》在80年代初所具有的“反潮流”性质，恰与80年代中后期《平凡的世界》际遇相同。在现实主义“衰微”、现代主



义“崛起”的潮流化趋势之中，路遥坚守现实主义传统，除上述对历史连续性和文学的实践价值充分认识的原因之外，亦有对其时现实主义文学尚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洞见密不可分。现实主义“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77]。80年代中后期迄今30余年间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也充分说明路遥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路遥更具历史感的眼光观之，则20世纪80年代批评界一度以“现代派”排斥和压抑“现实主义”，乃是“一种批评的荒唐”。就根本而言，“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78]。马尔克斯既有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结构之《百年孤独》，亦有以经典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之《霍乱时期的爱情》，从长远的文学史眼光看，二者在经典的意义上并无高下之分。何况作为新的文学现象的现代派文学的兴起虽有文学观念和技巧革新意义上的历史合理性，现实主义所依托的思想和审美资源也并非一成不变。问题的要点在于：“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79]如拉美作家，虽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却并未亦步亦趋跟踪而行，而是“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80]。也因此——

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薄自己呢？^[81]

几乎在路遥作如上反思的同时，陈忠实、贾平凹正在酝酿其写作的“中年变法”。距《早晨从

中午开始》写作完成仅年余，作为“陕军东征”代表作品的《白鹿原》和《废都》相继出版。这两部作品分别表达了对中国古典传统思想和审美现代意义的肯定。《白鹿原》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乡村伦理道德衰微的叹惋，被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再传统化”思潮密切相关^[82]。《废都》则被认为是赓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的典范之作。二者与中国古典思想和审美传统的关系，以及在古典传统延长线上的诸多作品在此后20余年间的不断涌现，也充分说明路遥对现实主义资源向中国古典传统拓展的认识的重要价值。而融通1942年《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国古典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不仅是文学观念易代之际的可能性选择之一，亦可令更妥帖地评价路遥文学观念的文学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成为可能。

历史地看，《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阶段性的文学潮流的“背反”之处，恰正说明路遥所持的，乃是一种更具历史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观念。属1942年由《讲话》精神开启，中经柳青《创业史》进一步推动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80年代的自然延续。也因此，除反复申论现实主义的时代价值外，《早晨从中午开始》亦强调“深入生活”的意义，以及读者大众作为文艺评判的“主体”的重要价值。“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83]自80年代末迄今，《平凡的世界》作为“畅销书”所产生的持续而广泛的影响力无需多论。作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平凡的世界》激励一代又一代身处底层的年轻人以不懈的奋斗投身时代前进的洪流，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恰属路遥所论之“深入生活”的要义所在。“深入生活”并非仅属写作材料获取的简单方式，而是内含着独特的全面性地感知和体验世界，从而与“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保持心灵相通的意义——此与现代派的“向内转”恰成鲜明对照。路遥所说的“读者大众”，也并非一种中性的普泛指称，而是可与“人民”这一概念相通——如其所言：“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



要。”^[84]如是种种，均表明路遥文学观念与《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内在承传关系。《早晨从中午开始》所阐发的文学和世界观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需要在这一思想的连续传统中得到恰切的理解。

柳青以为文学的经典化应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在同时代人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即路遥所说的“当代眼光的评估”和“历史眼光的审视”——之间，柳青显然偏重后者。如今距离《平凡的世界》在1986年末所面临的评价的困难不过30余年，作为总体性书写1975—1985年转型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作品，《平凡的世界》的意义已然得到了更具历史感的价值评定。路遥写作所依凭的柳青传统，在评论界已不复“重写文学史”发轫之始的有限度的肯定态度。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学观念虽有与时推移起伏无定的表象，亦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的质的连续性。在百年中国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以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观重评以柳青、路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并敞开立足现实、融通过去并朝向未来的思想和审美视域的意义，亦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陕西经验’研究”(批准号19FZW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厚夫：《路遥传》，第316—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张艳茜：《路遥传》，第29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 路遥虽将文集的编选视为自己此前创作的总结，但这种总结，仅具有阶段性意义，并非是对个人写作的“盖棺论定”。在作为“总结”的后记中仍有朝向未来不断精进的振拔气象。《〈路遥文集〉后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94—29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下同。

[4][8][9][10][39] 转引自畅广元：《我所认识的路遥》，晓雷，李星编选：《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73页，第72页，第72—73页，第73页，第7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 畅广元：《心灵探索者的心灵——〈神秘黑箱的窥视〉前言》，第7页，第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6][12] 李继凯：《我与路遥的“遭遇”》，《文艺报》2013年12月16日。

[11] 参见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3][14][15][16][30][32] 李继凯：《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畅广元编：《神秘黑箱的窥视》，第35页，第35页，第35—36页，第36页，第38页，第3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7][19][27][34][35][49][51][52][55][56][64][70][71][77][78][79][80][81][8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9—60页，第59—60页，第62页，第62—63页，第62页，第57页，第13页，第13页，第15页，第14页，第15—16页，第11页，第20页，第15页，第16页，第14页，第14页，第14页，第15页。

[18] 同属改革书写，且基本模式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平凡的世界》和《浮躁》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参见杨晓帆：《路遥论》，第204—212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20] 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贺照田、余英等著：《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第47页，中国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8年版。

[21] 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22] 董丽敏：《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3] 参见甘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24] 参见杨辉：《“一代人”的“表述”之难——杨庆祥〈80后，怎么办？〉读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3期。

[25] 参见杨辉：《〈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26][65] 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28] 解志熙：《一卷难忘唯此书——〈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29] 此一问题在今天的延续，便是“中国文学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中产阶级化”。因此，“可以重新讨论现实主义



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可能,对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的关注,对更多的群体性的‘人’的关注。”周展安,蔡翔:《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难题”与“意义”——蔡翔教授访谈录》,《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

[31] 王汎森:《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序》,丘为君:《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版。

[33] 如费孝通所论,道德观念“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就社会观点而言,“道德是个人对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第3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6] 汪炎:《漫忆路遥》,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不平凡的人生》,第17—18页,内部资料。

[37] 路遥所论之“情感”所指较为丰富,但对人物、土地等等的个人情感应属其中的重要部分。如其所论,“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参见王愚:《“文章憎命达”——忆路遥二三事》,晓雷、李星编选:《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第75—7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8] 参见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及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两文均见于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40][41][42][46] 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6期。

[43][44] 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87年第2期。

[45][47] 转引自王刚:《路遥年谱》,第210页,第210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48] 参见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 and 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50]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榆林路遥文学联谊会编:《不平凡的人生》,第122页、第121页,内部资料。

[53] 参见杨辉:《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

花〉时期”而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54] 张均:《重估社会主义文学“遗产”》,《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57] 与路遥交往甚厚的海波认为:“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为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

[58][59][60] 乔·米·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郭值京等译,第193页,第196页,第19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61][62][63] B·苏契科夫:《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卢永华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6页,第32页,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第234页,第234—235页,第2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6] 路遥:《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40页。

[67][68] 卢卡契:《现实主义辩(1938年)》,卢永华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第6页,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9] 路遥:《柳青的遗产》,《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37页。

[72] 参见张均:《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73] 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74][75] 参见路遥:《漫谈小说创作——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09页,第109页。

[76] 路遥:《致蔡葵》,《早晨从中午开始》,第601页。

[82] 参见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84] 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早晨从中午开始》,第91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艳